

以共享式增长促进

# 社会和谐

林毅夫 | 庄巨忠 | 汤敏 | 林曦 | 编



中国计划出版社

ADB

# 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

林毅夫 庄巨忠 汤敏 林曦 编

中国计划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 / 林毅夫等编.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80242-086-1

I. 以… II. 林… III. 经济增长—研究—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7436 号

**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

林毅夫 庄巨忠 汤敏 林曦 编

☆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11 号国宏大厦 C 座 4 层)

(邮政编码: 100038 电话: 63906381 63906433)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1/16 17.5 印张 256 千字

2008 年 4 月第一版 200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

ISBN 978-7-80242-086-1

定价: 40.00 元

## 编者按

本书收录的文章是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研究课题准备的背景研究报告。这一课题由亚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汤敏和亚行助理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共同负责。研究框架由课题组成员集体讨论而成。这些报告在2007年8月9日亚行在北京举办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战略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得到了参会100多名来自中国有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大学和国际机构专家学者的有益评论。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亚行驻中国代表处和中国财政部国际司亚行处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仅反映作者本人的观点，而不代表亚洲开发银行及其董事会或各成员国政府的观点。亚行并不保证本书中数据的准确性，对使用这些数据所产生的后果不负任何责任。

编者

2007年12月

## 作者简介

**艾弗兹·阿里**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庄巨忠**

亚洲开发银行助理首席经济学家

**汤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林墩**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

**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冯明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助理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罗楚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樊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研究员

**刘培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达玛·娅秀**

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

**林芬**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刘民权**

北京大学教授，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俞建拖**

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 前 言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超过8%。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计算，在1990年~2005年期间，中国的贫困人口由32.5%下降为7.1%，减少了25个百分点。这样的成就在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当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人际、城乡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收入差距的扩大并非只是中国所面临的发展问题，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都有不同程度的恶化。增长和减贫过去一直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所考虑与关注的重点。但是最近几年，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怎样使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更加公平，使增长的成果能够更广泛地分享，也逐渐成为发展政策讨论与研究的焦点。“共享式增长”的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所接受和采纳。

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增大改革的阻力与难度，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因此，中国政府最近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并在2006年公布的第11个五年计划中把它定为一项基本国策。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基本国策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与“共享式增长”的理念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在这一背景下，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和驻中国代表处在2007年初，联合开展了一个“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的研究课题。该课题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在这一课题下，中国国内资深的学者与亚洲开发银行的职员共准备了九篇报告。2007年

8月9日，100多名来自于中国有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大学和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汇聚在北京讨论了这些报告。本书汇总了在这些报告基础上形成的10篇文章。

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目前及将来几年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经济与社会课题。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抛砖引玉，引起中国国内及国际对此课题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艾弗兹·阿里



2007年12月



#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综 述 .....	(1)
第二章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 .....	(22)
第三章 以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一个战略框架 .....	(30)
第四章 以初次分配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促进和谐发展： 中国改革三十年的简要回顾和展望 .....	(40)
第五章 中国重构福利体制的思考 .....	(89)
第六章 共享式增长与中国新阶段扶贫 .....	(130)
第七章 增长形式、就业和收入差距：东亚经验与对 中国的启示 .....	(148)
第八章 “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拉美的教训 .....	(180)
第九章 1990年~2004年中国收入差距与增长 益贫性的研究 .....	(213)
第十章 金融结构、中小企业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研究 .....	(233)

# 第一章 综 述

林毅夫 庄巨忠 汤敏 林曦<sup>①</sup>

## 一、引言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在1979年至2006年期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5%,居世界首位。197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12位,到2005年,已经跃居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同时,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为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过去近30年中,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每年以7%的速度增长,贫困人口比率大幅度下降。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Ali和Zhuang, 2007),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计算,在1990年~2005年期间,中国的贫困人口由32.5%下降为7.1%,减少了25个百分点;按照每人每天2美元标准计算,贫困人口由71.5%下降为29.4%,减少了42个百分点(ADB, 2007b)。这样的成就在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

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加剧,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根据国内学者的估计,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从大约0.3增加到了大约0.45(何娅, 2007; 李实等, 2007; 刘民权等, 2007)。在很大程度上,贫富差距的加剧来源于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1985年~2005年期间,城镇与农村的人均收入比例从1.9:1上升到了3.2:1,而沿海与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比例也从1.4:1上升到了大约2:1(庄巨忠, 2007)。即使在同一地区或同一省份内,无

---

<sup>①</sup> 本章的观点仅代表作者,而不代表作者所在的单位或机构。

论是城市居民之间还是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非常显著。除收入差距外，非收入方面的差距也在扩大。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居民在接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所面临机会的不平等（Tandon 和 Zhuang, 2007）。

收入差距的扩大并非只是中国所面临的发展问题。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收入分配都有不同程度的恶化。亚洲开发银行的最新研究表明（ADB, 2007b），除中国以外，在有数据可查的 21 个亚洲发展中国家中，14 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有所上升，其中上升最为显著的是尼泊尔、柬埔寨、斯里兰卡、孟加拉、老挝、印度等。国际上和地区内的有识之士越来越意识到，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亚洲经济发展的一个隐患，它会加剧政治和社会矛盾，从而危及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收入分配已成为亚洲目前发展道路上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增长和减贫过去一直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所考虑与关注的重点。但是最近几年，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怎样使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更加公平，使增长的成果能够更广泛地分享，也逐渐成为发展政策讨论与研究的焦点。“共享式增长”（Inclusive Growth）<sup>①</sup> 的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包括双边和多边国际组织所接受和采纳。例如，亚洲开发银行不久前任命了一个名人小组来探讨亚洲地区发展的前景，以及亚行将来应承担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这个小组呼吁亚行把其战略重心由支持减贫扩展到支持共享式增长（ADB, 2007a）。

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如果不加以有效控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增大改革的阻力与难度，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甚至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中国的决策层最近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并在 2006 年公布的第 11 个五年计划中把它定为一项基本国策。2007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基本国策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与“共享式增长”的理念有很多的共同之处。但是，政府部门与学术界对于具体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

<sup>①</sup> 国内也有学者把 Inclusive Growth 译为包容性增长。

手段来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还有争议。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在所难免，任何政策都无补于事的，也大有人在。这些都有待通过讨论，来解决纷争，寻求共识。

在这一背景下，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和东亚局在2007年初，联合开展了一个“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的研究课题。该课题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在这一课题下，国内资深的学者与亚洲开发银行的职员共准备了九篇报告。2007年8月9日，100多名来自于国内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大学和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汇聚在北京讨论了这些报告。本书汇总了在这些报告基础上形成的九篇文章。

## 二、研究结果与政策建议

本书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五篇文章。重点是探讨共享式增长的基本概念，它的政策含义，及中国应如何实施以共享式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来促进社会和谐。第二部分收录了两篇文章。重点是讨论东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第三部分收录了两篇文章，侧重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化及其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 （一）共享式增长与政策选择

在第二章，艾弗兹·阿里首先概要地描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近几年收入和非收入方面差距的变化。虽然从国际范围看，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不算是最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收入差距问题可以掉以轻心。这是因为中度的收入差距可能与某些核心福利指标的高度差距并存。而低收入差距也可能与资产占有以及享受基础设施服务方面的较大差距并存。财富和资产的集中意味着经济上处于弱勢的群体很难获得潜在的发展机会。在许多亚洲开发银行发展中成员国的一些地区，很多人用不上电，看不上病，喝不上洁净的水。作者然后讨论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对贫困发

生率的影响。尽管亚洲许多国家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近几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削弱了增长的减贫效果。如果收入差距没有扩大或者甚至缩小，这些国家近几年收入增长的减贫效果会更大。以中国为例，如果收入分配没有恶化的话，在2004年，以每人每天1美元贫困标准衡量的贫困率将会比实际水平低5.7个百分点。

艾弗兹·阿里进一步探讨了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对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他指出，在这方面，近几年的研究文献较多地强调了“财富效应”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就财富效应而言，明天的财富或收入与今天的财富或收入紧密相关。那些财富很少或收入很低的人群无法创业或投资以增加财富和收入，因此无法脱贫。有意思的是，根据这种观点，财富的再分配，不仅不会产生负面的扭曲效果，而且还会促进经济增长。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虑，一种观点认为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引发财富再分配的要求，而伴随着再分配的讨价还价过程，不管是和平但漫长的街道游行还是暴力行动，成本都会很高。另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考虑是基于过大的收入差距对制度和政策有效性的负面影响。如果过大的收入差距使得高收入阶层有可能操控经济从而获利，经济增长前景就很有可能受到伤害。

艾弗兹·阿里最后讨论了应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公共政策。他指出，这里需要区分收入差距是由个人努力（efforts）的不同所造成，还是由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circumstances）的差异所造成。由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的差异造成的收入差距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伦理上都是不能接受的，必须通过公共政策加以解决。公共政策应致力于促进机会的创造，并通过保证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机会的平等。显然，即使在公共政策保证了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个人的努力程度、愿意承担风险的程度及事业心的不同，结果的不平等仍然存在。这种由于努力程度不同所导致的结果不平等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虽然就业机会的创造是企业层面的问题，但企业经营所处的环境会受到公共政策和公共投资的影响。为了消除因外部环境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确保给社会所有阶层和所有地区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亚洲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公共政策、公共投资制定与实施的制度及

治理方面进行进一步改革。

在第三章，庄巨忠提出了共享式增长作为一个发展战略的概念性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共享式增长被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这一界定把产生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的不同，另一类是个人的努力与勤奋程度的不同。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包括如家庭财富与权势，宗教信仰，社会关系，肤色，性别，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工作的行业等等诸多因素。由这些因素造成的收入差异反映的大多是由制度缺陷，市场失灵，或者是政策失误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另一方面，个人的努力和勤奋程度则是可以主观控制的，由此造成的收入差异反映的是市场机制的酬勤惩懒，是良好的激励机制起作用的表现。这样的激励机制鼓励创业与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这一分类使人们能够区分“机会的不平等”与“结果的不平等”这两个相关而又不相同的概念。机会的不平等通常是由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的不同所造成，而结果的不平等，除了一部分反映机会不平等，还有一部分反映的是个人努力和勤奋程度的差异。

文章认为，机会平等是共享式增长的核心，而强调机会平等就是要通过消除由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文章指出，在政策层面，以共享式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需要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个是通过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大量就业与发展机会，另一个是促进机会平等，提倡公平参与。文章认为，为了促进机会的平等，政府需要在三个方面加以努力：第一，增加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服务的投入，来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与发展潜能；第二，加强政策与制度的公平性，消除社会不公，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第三，建立社会风险保障机制以防止与消除极端贫困。

作者指出，以共享式增长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经济保持高速和持续增长；只有通过高速和持续增长，才能创造大量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仍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之中，市场，体制和政策的不完善会造成经济增长过程中机会

的不平等，并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消除各种各样的机会不平等，从而促进增长的共享性。

在第四章中，林毅夫和刘培林探讨了如何通过高速与高效的生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达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以促进社会和谐，从而着重对共享式增长的第一个战略支柱在中国的实施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文章提出，通过发展目前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里面的劳动密集区段，中国可以在一次分配领域就兼顾效率和公平。从而，作者对目前流行的一种观点，即一次分配应注重效率，以实现“快”的发展；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以实现“好”的发展，提出了质疑。

文章指出，如果选择遵循符合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实现成本最小化，从而具备很强的自生能力，使得它们即便没有政策垄断和行政手段的保护也能具有竞争优势，实现快速与持续的发展；这样，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本积累速度，进而资本相对于劳动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速度，以及由此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升级速度，都能够达到潜在的最高水平；从而实现初次分配的效率目标。这样的生产模式必然可以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充分就业和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让依靠劳动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同时，在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作用下，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稀缺性会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增长速度会快于“富人”资本报酬的增长速度。最终，普通劳动者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进而实现初次分配的公平目标。

作者认为，这种生产模式对二次分配也有积极的影响。首先，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能够用于二次分配的资源总量就多；其次，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能够充分就业，需要二次分配支持的将主要限于失掉就业能力的“鳏寡孤独废疾者”和临时失业的人群，数量会较小，使二次分配所需要的税率不用太高，征税面和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力度不用太大，对纳税人生产积极性的影响就会较小，征税也会较容易；最后，二次分配本身的财务可持续性也会较好，政府不需要通过赤字财政为二次分配融资，从而不会危害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而且，在这种模式下，不需要对生产领

域里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进行保护与补贴，这也有利于政府将其职能转变到公共财政领域。

文章进一步指出，无论从目前时点横向比较角度看，还是从乐观情景下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进行预测和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在今后 15 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发展阶段仍然超不出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资本相对稀缺、劳动相对丰富的要素禀赋结构不会有根本改变。正因为中国这种要素禀赋结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中小型企业市场信号的引导下，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的产业或者资本密集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区段，推动了并将继续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由于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尚未最终完成，国民经济中仍然遗留着许多不利于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扭曲，使得发展模式未能完全从传统的赶超转变为按比较优势发展，从而导致了城乡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些制度扭曲包括，首先，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使得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第二，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偏低，造成初次分配不公和大量寻租与腐败行为；第三，为扶持某些行业的国有企业而设立的行政性垄断，造成国有部门内部收入分配不公，以及其他企业为取得市场准入许可而向政府寻租；第四，地方财政体制和政府政绩考核机制不当，造成地方政府通过诸如土地、基础设施等方面价格和税收等诸多优惠手段追求短期增长和局部利益而不顾长期增长、整体利益和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文章对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改善金融结构，放开市场准入，大力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中小型制造业和服务企业。第二，提高资源税费到合理水平；同时，深化国有矿山企业改革，剥离社会性负担，消除压低资源税费水平的理由。第三，垄断行业如能引入竞争尽可能引入竞争。对不宜引入竞争的行业，政府要加强行业监管，因垄断地位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应该交给国家。第四，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改变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办法，弱化地方政府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的激励。

最后，文章对二次分配领域的政策调整也提出了建议，认为应该从三个角度着手：第一，促进而不是阻碍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形成。目前各地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各自社会保障水平。从一般原则而言，随着经济发展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无可厚非，但如果各地保障水平过分悬殊，经济充满活力、需要承载更多劳动力的高保障水平地区，就不愿意吸纳其他地区的劳动力，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此，应该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直到实现全国统筹。第二，建立偏向于生产型而不是消费型的公共支出结构。为促进和谐发展，二次分配领域能够筹集到的有限资金的支出结构应该进一步优化，缩小政府公务活动和办公设施等消费型支出；增大教育等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生产型支出，普遍提高劳动力素质，为产业升级创造条件；并有效阻断收入差距在代际之间转移。第三，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进行针对性救助。救助制度设计需要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通过针对性的救助提高有限的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使救助资金的最终受益者真正落实在弱势群体上，另一个原则是救助水平要保证财务上的可持续性。

在第五章，卢迈和冯明亮讨论了如何重建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以确保国家对教育、卫生和基本社会服务的投资，建立有效的社保体系，促进机会的平等，从而着重对共享式增长战略框架的第二个支柱在中国的实施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文章指出，中国重构福利体制的努力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但最初主要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加以推行，真正的全面重构始于本世纪初。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在反贫困政策、教育政策、就业政策、医疗政策、养老政策和住房政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调整，城乡二元的福利体制逐步趋向统一。虽然目前福利水平较低、但覆盖较广，政府承担的责任也在迅速扩大。在这一福利体制中，政府社会政策的目标是提供普遍的安全保障和帮助低收入人口，而不是利用收入再分配来保证平等的收入水平，而且积极的人力资源开发在福利体制中的地位也进一步上升。

但是文章认为，由于担心增加生产成本影响经济增长和落入所谓的“福利陷阱”，政府的努力较为谨慎：在整体上缺乏规划和明确的指导思想，在行动上则强调“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避免作出过高的社会承诺。渐进式的社会改革与“摸着石头过